

# 中國古代佛教三寶供養與“經像瘞埋”

——兼談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原因

張先堂

## 一、問題的提出

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封閉的原因可謂千古之謎。自從 100 多年前藏經洞被發現後，世界各國的敦煌學學者一直在執著地探求解開這個謎底，為此提出了“避難說”<sup>1</sup>、“書庫改造說”<sup>2</sup>、“廢棄說”<sup>3</sup>、“末法說”<sup>4</sup>、“供養說”<sup>5</sup>等種種假說。

近些年來，筆者也一直關注這一問題的探索。多年考察思考的結果，成為“供養說”的贊同者。2010 年筆者曾撰文指出：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藏經的來源、結構及其封閉都與佛教法供養活動密切相關，是法供養的產物<sup>6</sup>。之後，筆者仍然在持續地關注和思考這一問題。本文旨在考察中國古代各地曾經普遍出現的“經像瘞埋”現象，並進一步申論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與佛教三寶供養的內在關係。

## 二、中國古代各地“經像瘞埋”現象及其相關問題探討

1900 年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後，長期以來學者們都是把莫高窟藏經洞作為一個孤例來探討的。但自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廣大地區持續不斷地發現了一

<sup>1</sup>見伯希和《敦煌石室訪書記》，法國《遠東學院院刊》，1908 年，安南出版（陸翔漢譯文載《北平圖書館館刊》1935 年 9 卷 5 期）；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東方雜誌》1909 年 6 卷 10 期；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 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79 年；閻文儒《莫高窟的創建與藏經洞的開鑿及其封閉》，《文物》1980 年第 6 期。

<sup>2</sup>見藤枝晃《敦煌“藏經洞”的一次復原》，載《1990 年敦煌學國際研討會文集·石窟考古編》，遼寧美術出版社，1995 年。

<sup>3</sup>見方廣錫《敦煌遺書中的佛教著作》，《文史知識》1988 年第 10 期；《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之我見》，《中國社會科學》，1991 年第 5 期。

<sup>4</sup>見梅林《敦煌藏經洞研究的兩個問題》，敦煌研究院編《2000 年敦煌學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提要》，2000 年；沙武田《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再探》，《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

<sup>5</sup>見文正義《敦煌藏經洞封閉原因新探》，戒幢佛學研究所編《戒幢佛學》第二卷，嶽麓書社，2002 年。

<sup>6</sup>見拙文《古代佛教法供養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敦煌研究》2010 年第 5 期。

批又一批古代佛教信徒在地下土坑、窖穴、塔室、地宮等處人為埋藏的古代佛教造像、經卷等文物。隨著此類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學者們逐漸認識到，在中國古代各地曾經相當普遍地存在過將佛教造像、經卷等予以埋藏的現象。筆者認為，這種現象可以稱之為“經像瘞埋”。

對於中國古代“經像瘞埋”特別是佛像瘞埋的現象，除了對各地出土佛像具體案例的考古報告和研究外，近年來已經有學者開始注意從宏觀的角度考察這些不同地區具體案例之間的聯繫。崔峰先生曾梳理、羅列了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陝西、四川等省不同時期的 20 例重要佛像出土事件<sup>7</sup>。筆者梳理、考察了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有關考古報告，發現“經像瘞埋”的案例至少可以增加到 56 例，並可將其分為佛像瘞埋、佛教經像混合瘞埋二類（詳見正文之後附錄《古代中國“經像瘞埋”案例》）。

筆者認為，總結古代中國“經像瘞埋”現象，我們可以得出兩點基本認識：

其一，“經像瘞埋”是中國古代廣大地區相當普遍的現象，也可以說是中國佛教史上具有一定規律性的現象。但由於埋藏經像的案例散見於中國各地、出現於不同歷史時期，以往的考古材料豐富而零散，人們往往將注意力集中於各個地區不同時期經像埋藏具體案例的考察。尚未顧及對“經像瘞埋”現象從宏觀的角度展開全面的歸納和深入的分析。隨著一百多年來在中國各地窖穴、土坑、佛塔、洞窟等處發現的古代理藏的佛教經典、造像材料的大量積累，以及人們對於這些考古材料的認識逐漸全面和深化，我們不應當再將它們作為一個個孤立的個案來研究，而應該將它們聯繫起來，置於中國古代佛教歷史文化的整體背景下來考察，深入揭示它們之間內在的規律和聯繫。

其二，佛像瘞埋與經像混合瘞埋二種現象雖然在起因、表現形式上有所區別，但它們又具有內在的聯繫，在本質上具有一致性。因而有必要從宏觀的層面將它們聯繫起來，對相關的問題予以深入探討。

### （一）“經像瘞埋”的原因

為什麼要瘞埋佛教經像？這是人們首先關注的問題。對此學者們也曾提出多種不同的假說予以解釋。筆者認為，“經像瘞埋”出現於中國廣大地區不同時期，瘞埋的具體形式也有不同類型，並非單一原因所致，而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對此要結合具體案例與當時的佛教歷史背景來考察，對以往學術界不同的觀點我們也有必要予以重新審視和辨析。

#### 1. 與戰爭的關係

上世紀初學者們最初發現古代人為埋藏的佛教經像時，探究其緣由，首先想到

<sup>7</sup>崔峰《佛像出土與北宋窖藏佛像行為》，刊《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第79-87頁。

的是為避戰爭之難。伯希和最早論及莫高窟藏經洞封閉時間和原因時說：“是洞之封閉，必在十一世紀之前半期，蓋無可疑。以意度之，殆即 1035 年西夏侵佔西陲是也。”理由是“卷本所題年號，其最後者為宋初太平興國（976—983）及至道（995—997），且全洞卷本，無一作西夏字者。……洞中藏棄，至為凌亂，藏文卷本、漢文卷本、絹本畫幅、繪畫壁衣、銅制佛像及唐大中之豐碑，均雜沓堆置，由是可見藏置時必畏外寇侵掠而倉皇出此。”<sup>8</sup> 克茲洛夫發現黑水城河邊大塔中的大量西夏文物後，俄國學者起初“一般認為，‘輝煌’舍利塔於 1226—1227 年，在此城落入成吉思汗不久前，被密封起來。”<sup>9</sup> 後來“避難說”成為人們解釋佛教經像埋藏原因的一種習慣性思路。當發現山東青州龍興寺大型佛教造像窖藏後，“有人認為，龍興寺在金兵入侵時，因青州城池不保，而把這批佛造像埋藏起來。”<sup>10</sup> 甚至連山東茌平縣發現 12 件窖藏佛教銅像，也有人推測其根源“可能是因戰亂關係埋藏在地下”<sup>11</sup>。

筆者認為，“戰爭避難說”很難解釋中國廣大地區很長時期曾經普遍存在的經像埋藏原因。此說既不符合邏輯，也缺乏史實證據的支持。某一時期某一地區的兵燹戰火有可能禍延寺院，造成經像的損毀。但不可能造成經像不同時期內在許多不同地區大面積的殘損。無論莫高窟藏經洞封閉為避西夏進攻說，黑水城河邊大塔埋藏大量文物為避元朝成吉思汗進攻說，還是青州龍興寺大型佛像窖藏為避宋金戰爭之亂說，都面臨一個無法回避的尷尬：無論是西夏黨項人，還是元朝蒙古族人、金代女真人都信仰佛教，他們不可能有意地大規模地破壞佛教經像，敦煌、黑水城、青州地區的人們沒有必要為躲避戰亂毀壞而埋藏經像，更不可能為躲避他們的侵擾而將大量殘損破碎的佛教經像予以埋藏。據俄國學者研究，黑水城河邊大塔出土文物，既有西夏時期的、也有元代的，克平教授認為塔內文物經過了不同時期的“兩次填裝”<sup>12</sup>。這其實也就動搖了此塔為西夏躲避元朝進攻而封閉之說的根基。可能正是由於意識到“避難說”的這種尷尬，於是又有許多學者另闢蹊徑，力圖為“避難說”尋找新的突破，比如有多位學者提出了莫高窟藏經洞的封閉是為了躲避“黑韓王朝東侵說”<sup>13</sup>。但這種觀點更多的是出於推測，尚無具體史實證據的支持。

## 2. 與滅佛運動的關係

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佛像瘞埋與滅佛運動有關。的確，中國歷史上曾有過三武一

<sup>8</sup>伯希和《敦煌石室訪書記》。

<sup>9</sup>Kila Fyodorovna Samosyuk《黑水城的發現》，載《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 年 6 月中文第一版，第 45 頁。

<sup>10</sup>王華慶、莊明軍《青州龍興寺考略》，《中國文物報》1998 年 10 月 28 日。

<sup>11</sup>聊城地區博物館《山東茌平縣發現一處元代窖藏》，《考古》1985 年第 9 期。

<sup>12</sup>轉引自薩瑪秀克《俄藏黑水城藝術品·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1 頁。

<sup>13</sup>殷晴《敦煌藏經洞為什麼要封閉》，《文物》1979 年第 9 期；譚真《從一份資料談藏經洞的封閉》，《敦煌研究》1988 年第 4 期；榮新江《敦煌藏經洞的性質及其封閉原因》，《敦煌吐魯番研究》第 2 卷（1996），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7 年 10 月。

宗的大規模的滅佛運動，這是造成佛像殘毀、瘞埋的主要原因之一。

歸納中國古代瘞埋佛像出土案例有五個具有普遍性的特徵值得注意：

其一，窖藏佛像出土地區相對比較集中，此類案例最多的地區是山東（14例）、山西（8例）、河北（6例）、陝西（8例）、四川（5例），它們恰好是歷史上佛教發達、造像繁盛，而毀佛現象也比較嚴重的地區。

其二，窖藏的北朝、隋唐時代的銅造像大多保存比較完整，可能因其體型較小而易於藏匿掩埋，銅質鑲金的佛像又比較被人寶貴而有意保藏。建德三年（574），北周武帝下詔“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並禁諸淫祀，非祀典所載者，盡除之。”<sup>14</sup> 唐武宗會昌五年毀佛時，下令“天下廢寺，銅像、鐘磬委鹽鐵使鑄錢，其鐵像委本州鑄為農器，金、銀、鍮石等像銷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銀、銅、鐵之像，敕出後限一月納官，如違，委鹽鐵使依禁銅法處分。”<sup>15</sup> 據此推斷，多處北朝、隋唐時代的窖藏銅質（銅質鑲金）佛像很可能是為了躲避北周武帝、唐武宗毀佛的破壞而埋藏的遺留物。

其三，窖藏的北朝、隋唐時代的石造像多有殘損，有的殘損嚴重，軀體不全，身首異處；山東多處發現的東魏、北齊時代的石造像在頭面部、鼻部有用堅硬器物敲砸毀損痕跡，顯系人為的有意的侮辱性的毀壞，因此人們多推斷此類殘損佛像窖藏現象與歷史上三武一宗的滅佛運動有關，是確鑿有據的。

其四，很多案例顯示，窖藏佛像雜亂擺放，距地面較淺，隨意堆埋；山東昌邑市塔爾堡鎮高陽村保垓寺故址發現在古井中埋藏佛教殘石造像，表明它們當為毀佛運動時倉促掩埋。河北臨漳鄴城遺址東部北吳莊北漳河灘沙地內發現的巨大的佛教造像埋藏坑中發掘出土編號佛造像 2895 件（塊），造像碎片 78 個自封袋，達數千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出土遺物數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根據造像特徵、題記年代等初步確認，這批佛造像時代主要是東魏、北齊時期，另有個別北魏時期青石造像，亦見到個別唐代風格造像。這些佛造像擺放雜亂，因而楊泓先生“推測這批佛像可能源于唐代滅佛運動”。<sup>16</sup>

其五，窖藏佛像的出土地多為古代寺院遺址及其附近，表明這些造像很可能是由寺院僧人或由僧人組織佛教信徒就近埋藏的。

上述特徵表明，許多窖藏殘損佛像的案例與歷史上的滅佛運動有著密切的關係，是在滅佛運動時倉促掩埋的。

<sup>14</sup> 《北史》卷一〇《周本紀下》第一〇。

<sup>15</sup> 《舊唐書》卷一八上《本紀》第一八上。

<sup>16</sup> 見 [http://www.taiwan.cn/xwzx/dlzl/201203/t20120321\\_2396666.htm](http://www.taiwan.cn/xwzx/dlzl/201203/t20120321_2396666.htm) 大河網 2012 年 3 月 21 日報道《鄴城發現巨大佛教造像埋藏坑 級別史無前例》。

### 3. 與佛教供養的關係

除了上述滅佛運動中隨意掩埋佛像的現象外，筆者認為下列五種恭敬的、有計劃的、禮儀性的瘞埋現象，當屬於佛教徒對佛像的供養行為，應該予以特別注意。

其一，有些案例顯示，佛像埋藏時特別慎重，如山東諸城縣林家村鎮青雲村發現銅造像 6 件、四川邛崃縣東安鄉蜚虹村發現的 12 尊鑲金銅造像都是埋藏在陶罐中；山東茌平縣肖莊王菜瓜村發現 12 件文物、博興縣崇德村發現佛教銅造像 101 件都盛放在陶甕中，這顯示了埋藏者對佛像的尊崇與恭敬。

其二，許多案例顯示，佛像瘞埋並非滅佛運動時的倉促掩埋行為，而是在滅佛運動之後有目的地將殘損佛像集中起來予以規整的埋藏。如山東博興縣張官大隊發現的數十件石造像、博興縣河東村發現的 5 件銅佛造像、無棣縣水灣公社於何庵大隊發現的殘損石造像 7 件都是在窖藏坑內整齊地排列著；臨朐縣大關鎮上寺院村原明道寺舍利塔基下的地宮內發現的石造像、諸城市城南郊小山丘上修建體育中心時發現窖藏坑內造像殘軀都是分上下兩層整齊排列；濟南市縣西巷唐宋開元寺地宮遺址發現殘損的石刻佛像和泥塑近 50 尊被有規律地排列在地宮中央“壇”的四周；河南寶豐縣前營鄉大吳莊村發現的窖藏坑內造像排列成整齊的圓周狀。這種瘞埋形式更明顯地反映了埋藏者對佛像的尊崇與恭敬。

其三，有些窖藏案例顯示，埋藏者是把許多屬於不同時期、甚至不同寺院的多種材質、多種形式的大量殘損造像有意識地、有計劃地集中起來予以禮儀性的瘞埋。如甘肅省涇川縣大雲寺遺址佛教造像窖藏坑中造像分三層整齊地排列，體量較大的造像均仰身或面西側身而葬，體量較小或殘破者放置於空檔及四周；這些造像從質地分有石、陶、泥等，從類型上又可劃分為造像碑、造像塔（龕）、背屏式造像、單體圓雕造像等；它們的年代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時期。青州龍興寺遺址發現的大型窖藏坑內造像雖然大多數已遭到嚴重毀壞，但是造像卻並非被胡亂丟棄堆放於坑中，而是有規律的大致按上、中、下三層排列擺放，坐像都立式擺放，比較完整的身軀置於窖藏中部，各種頭像則沿坑壁邊緣排放，殘破的造像上部用較大的背屏式造像殘塊覆蓋，陶、鐵、泥、木質造像被放置於坑底，窖藏坑最上層的造像上留有席紋，表明造像掩埋前曾用葦席覆蓋；造像的年代從北魏歷經東魏、北齊、隋唐以迄于宋。據學者研究，青州龍興寺發現的 400 餘尊佛像並非全為龍興寺的造像，其中還包括青州其他寺院的佛像在內，其中有造像題記的東魏天平三年（536）張河間寺尼智明造像即為確證<sup>17</sup>。與北周武帝對佛教比較徹底的毀滅相比，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的滅佛舉措比較緩和，即二人的滅佛政策都不是要一舉摧毀佛教，而是明確規定對於“上州”和“敕額”寺院予以保留，並分別明令“其上州望各留寺一所，有列

<sup>17</sup>夏名采《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4年，第167頁；李森《也談青州龍興寺佛像並非全為該寺造像》，《敦煌研究》2007年第6期，第33頁。

聖尊容，便令移於寺內”<sup>18</sup>，“所有功德佛像及僧尼，並騰並於合留寺院內安置”<sup>19</sup>。因此，我們判斷像青州龍興寺、涇川大雲寺這樣歷史悠久、作為某一地區佛教文化中心的大寺很可能集中並埋藏了本地區許多寺院不同歷史時期雕造的不同材質、不同形式的造像，當是信而有征的。這樣大規模的佛像瘞埋表明它們很可能是地方佛教教團有計劃有組織的活動。

其四，還有一些佛像瘞埋案例顯示，它們是因為在長期禮佛使用過程中自然損毀不堪使用，因而予以瘞埋保存。青州龍興寺、涇川大雲寺等大規模窖藏中集中了不同時期不同寺院的大量佛像，推測其中除了滅佛造成的殘損外，當還包括有一些自然損毀的佛像。當然此類現象最典型的例證莫過於道士王圓籙在莫高窟建造的千像塔。此塔建成後，王道士請時任安肅觀察使兼嘉峪關監督的廷棟撰《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其中記載建塔的緣由：“寶相多殘，或捨身而空向化城，或赤足而徒存履跡，或露維摩半面，或皺菩薩雙眉，乃歎委棄緇塵，幾同天花之散落，何若虔修淨土，合成法塔，於名山收卅萬億化身，瘞歸圓明世界，所以浮圖創造，因取千相為名。”<sup>20</sup> 上世紀四十年代曾親臨莫高窟考察的衛聚賢記載：“按王道士以唐人寫經換到元寶後，將洞中古佛加以修補，原塑的神，頭有斷掉的，堆成土阜，因建一塔。”<sup>21</sup> 莫高窟的泥塑歷經千百年，至清末時已有大量殘損，王道士在敦煌化緣建造千像塔，予以瘞埋。

其五，有些佛像瘞埋案例表明，它們是由於造像形式陳舊過時不宜流行而有意識地予以埋藏。筆者認為，對此類現象以往人們尚未予以充分關注。如山西省沁縣南涅水發現的窖藏石刻造像總計 1100 餘件，分為造像塔、單體造像、造像碑三大類型，據造像題記可知，雕刻年代為北魏太和年間至北宋天聖九年（西元 477 年—西元 1031 年），歷經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宋六個朝代約 500 餘年。其中以造像塔最具代表性，約 400 餘件，這是中國發現的數量最多的造像塔，為他處所罕見。造像塔主要流行於北朝時期，是當時在開窟造像、雕造金銅和石刻造像之外，在民間興起的一種造像形式。曾在中國北方的山西、河北、陝西、甘肅等省出土，其中尤以山西南涅水出土的最為豐富。但遺憾的是對於這些珍貴的造像塔迄今未見有比較完整詳細的考古報告，僅見有一些簡要的介紹文章。筆者幾年前曾親赴南涅水石刻館考察，在 7 個展室中第一、三、五、七展室陳列有 60 餘尊單體造像，有許多尊頭部缺失，明顯可見人為損毀的痕跡；在第二、四、六展室陳列有造像塔 40 余幢 310 餘件，除個別有自然原因造成的塔身破裂、邊緣損壞外，大部分基本保存完好，未

<sup>18</sup> 《舊唐書》卷一八上《本紀》第一八上。

<sup>19</sup> 《舊五代史》卷一一五《周書》六。

<sup>20</sup> 廷棟《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原碑現存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完整錄文收入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第 3 卷第 10 期，1943 年 5 月，附錄 8，第 35 頁。

<sup>21</sup> 衛聚賢《敦煌石室》，《說文月刊》第 3 卷第 10 期，1943 年 5 月，附錄 8，第 35 頁。

見有人為損毀的痕跡，它們被埋藏的原因可以排除毀佛運動的因素。筆者推測，南涅水窖藏很可能集中了沁縣周圍多處寺院或民間的造像塔。這些流行於北朝的造像，歷經佛教文化藝術數百年的發展演變，至北宋時期已顯得陳舊過時不合時尚，因而將其予以瘞埋。

## （二）佛像瘞埋的性質

由上述可見，佛像瘞埋主要分為二類：一類是散亂埋藏，屬於毀佛時對殘破佛像的隨意處置；一類是對佛像恭敬的、有計劃的、禮儀性的瘞埋。後一類瘞埋現象最值得關注。對於它們的性質學者們曾有過不同的判斷。

李森先生認為青州龍興寺窖藏佛教造像的性質是在北宋時期山東地區流行的安葬佛像行為<sup>22</sup>；杜斗城先生認為山東出土的幾批造像皆為對廢棄的佛教造像的“舍利安葬”<sup>23</sup>；崔峰先生認為遍及山東、河南、河北、陝西、四川等省份的佛像埋藏行為不是“三武滅佛”時所為，而是一種護法之舉，殘損不齊的佛像被等同為舍利集中埋葬<sup>24</sup>。楊泓先生則指出：北宋時期，青州地區寺院盛行一種隆重的法會，寺院僧人將早年滅佛活動中損壞佛像或經年累月破舊的佛像集中起來，然後舉行隆重的儀式，將它們埋葬起來，以積累功德<sup>25</sup>。

上述觀點雖容有不夠周密之處，但他們都擺脫了著重從外部社會歷史背景尋找原因的“避難說”的窠臼，注重從佛教歷史文化本身尋找根源，各有其合理之處，啟發我們以新的思路來探討“經像瘞埋”現象。

筆者認為，“安葬佛像行為說”僅僅說明了表象，尚未揭示出其內在本質。“佛像等同舍利安葬說”似難以自圓其說。雖然舍利與佛像都與佛相關，但二者又各有所指。“舍利”專指佛以及高僧的遺骨，將佛像等同於舍利，既無典據支持，又有混淆名相之弊。其實從佛教史來看，舍利瘞埋與佛像瘞埋是互相相關而又各自不同的佛教歷史文化現象。上述諸說中，以楊泓先生的說法最為接近史實並能深入揭示其本質，青州窖藏佛像是北宋時的僧人將以往滅佛損壞的佛像或長年累月自然破舊的佛像集中埋藏，作為功德。在筆者看來，這其實屬於佛教的三寶供養行為。

供養又稱供施、供給，或略稱供，本為供給資養之意，起初指以飲食、衣服等生養之資供給佛法僧三寶以及父母、師長、亡者，後來也指崇敬、讚歎、禮拜等精神

<sup>22</sup>李森《山東青州龍興寺窖藏造像性質考》，刊《廣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12期，第147—149頁。

<sup>23</sup>杜斗城《山東龍興寺等佛教造像“窖藏”皆為“葬舍利”說》，劉鳳君、李洪波主編《四門塔阿闍佛與山東佛像藝術研究》，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第153頁。

<sup>24</sup>崔峰《佛像出土與北宋窖藏佛像行為》，刊《宗教學研究》，2010年第3期。

<sup>25</sup>楊泓《梵音淨土之青州佛像之謎》，《探索發現》欄目《考古中國》第五部，中央電視臺10頻道，2004年6月9日。

性的供養。供養既是佛教的一個基本概念，又是佛教宣導的一種重要修行活動。在佛教經論中有大量關於供養的論述，不同時代、不同宗派的經典對供養的物件、方法，供養物的種類，供養的功德、意義等方面有多種不同的表述，提出了二種供養、三種供養、三業供養、四種供養、四事供養、五種供養、十種供養等等不同的概念，都是根據供養的對象、供養物的種類、供養的方法不同而做出的種種分別<sup>26</sup>。其實從根本上來說，佛教供養的核心對象是佛、法、僧三寶，種種名目繁多的供養最終都可以歸結到三寶。對佛（佛舍利、佛像）的供養為佛寶供養，對法（佛經）的供養為法寶供養<sup>27</sup>，對僧的供養為僧寶供養。因此，上述中國古代各地長期普遍存在的佛像瘞埋，特別是對佛像恭敬的、有計劃的、禮儀性的瘞埋現象，其實如同佛舍利瘞埋一樣，都是佛教徒的佛寶供養行為。從義理來說，佛教要“藉像表真”，從佛教信徒來說，見像如見佛。雕造佛像自然是對佛寶的供養，對破損、陳舊的佛像進行妝鑿、修補，莊嚴法相，也是對佛寶的供養。對殘損、陳舊以致法相不夠莊嚴、不堪使用的佛像，根據中國人入土為安的傳統文化心理，予以精心的收集瘞埋，同樣是佛寶供養行為。其目的是避免其再遭破壞，從而達到長久保存住持。這正如廷棟讚譽王道士建成莫高窟千像塔的功用時所說：“凡剝蝕之佛光，枕藉於幽邃者，胥免暴露，而藏壽域矣。”

### （三）經像混合瘞埋的性質

與佛像瘞埋大多與滅佛運動相關，是在滅佛時和滅佛後被動地埋藏佛像不同，經像混合瘞埋顯然完全是佛教信徒一種自主的、有計劃的佛寶、法寶供養行為。

有一個現象值得關注：從中國古代經像混合瘞埋的案例來看，凡出現經像混合瘞埋之處，均與塔相關，都是在塔身中塔刹、塔室、塔基下地宮等處。塔在印度原本是為埋藏、供奉佛舍利而建。塔流傳至中國後，其功能被逐漸擴展，除了供奉佛舍利外，也被用來埋藏、供奉高僧舍利。此外還被用來埋藏、供奉佛像、佛經，因為佛像代表佛身，佛經代表佛的教法，其目的是將佛教三寶共同埋藏、供養。塔中埋藏、供養的佛像、佛經不排除完整無缺者，但鑒於佛塔原本屬於瘞埋佛舍利的性質，故塔中埋藏的大部分是殘缺、陳舊、退出流通使用的佛像、佛經。

由於塔的空間容量有限，因而大部分塔中埋藏的佛像、佛經數量較少。但由於特殊的緣由，某些塔中也會埋藏大量的佛像、佛經，如陝西耀州神德寺塔、寧夏賀蘭縣宏佛塔、黑水城河邊大塔即為此類典型代表。

<sup>26</sup>參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佛光大詞典》中“供養”條目的解釋。

<sup>27</sup>參見拙作《古代佛教法供養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敦煌研究》2010年第5期。



#### (四) 經像瘞埋的歷史演變

經像瘞埋現象經過了長期的發展演變，其中以佛像瘞埋出現較早。它最早出現於北朝末期，是伴隨著北魏武帝、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之後而出現的，特別是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強度高，持續時間久，造成北方廣大地區北魏、東魏和北齊時代雕造佛像的大面積損毀。之後在北朝末年、隋代、唐初，開始出現較大範圍的佛像瘞埋。山東、河北、山西、寧夏等省的佛像瘞埋案例大多屬於這一時期。

唐武宗、後周武帝的大規模滅佛運動又造成大面積的佛像損毀。在北宋時代佛像瘞埋達到高潮，因為在以往歷次滅佛運動之後各地已經積累大量殘毀佛像，同時也積累了大量自然破損和陳舊過時的佛像。從全國多地同時出現佛像大規模瘞埋的現象推測，很可能此時全國和各地佛教教團有計劃地組織了殘破、陳舊佛像的大規模清理，於是在北宋時代興起了佛像瘞埋的高潮。中國幾次大規模的集中瘞埋佛像的案例都出現在這一時期，如山西南涅水、山東青州龍興寺、河北曲陽修德寺、甘肅涇川大雲寺大規模佛像窖藏均為這一時期佛像瘞埋現象的代表性案例。

經像瘞埋在西夏、元代、明代時雖然已趨於低潮，但仍然流行。寧夏宏佛塔、黑水城河邊大塔堪稱這一時期的代表。在清代時仍有其餘緒。如莫高窟王道士造“千像塔”即為典型案例。王道士雖為道士，但清代時儒釋道三教高度融合，道士而行僧人之舉不足為怪。千像塔雖由王道士發起組織修建，但並非其個人行為。據《敦煌千佛山皇慶寺緣簿》可知，參與捐款修建千像塔瘞埋莫高窟殘損佛像的有數十人，其中大多為地方官員、紳商<sup>28</sup>，由此可知千像塔的修建實為敦煌地方佛教教團與佛教信徒的集體行為，是承襲前代傳統而進行的瘞埋佛像供養佛寶活動。

經像瘞埋現象從北朝開始，直至清代末年，延續一千三四百餘年，可謂歷史悠久。

### 三、莫高窟藏經洞與古代佛教三寶供養關係再論

五年前，拙文《古代佛教法供養與敦煌莫高窟藏經》探討了莫高窟藏經與佛教法供養的關係。筆者認為敦煌莫高窟藏經洞藏經的來源、結構及其封閉都與佛教法供養活動密切相關，是法供養的產物。五年後，在對中國古代的經像瘞埋現象做了一番比較全面的梳理和考察之後，接著再來探討莫高窟藏經洞封閉的原因問題，筆者覺得視野似乎變得開闊許多，思考似乎有了更多的參照物，思路也有了進一步的深化與拓展。

<sup>28</sup>參見王慧慧、梁旭澍、蕭薇、張海博《〈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敦煌千佛山皇慶寺緣簿〉錄文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14年第5期。

### (一) 莫高窟藏經洞屬於“經像瘞埋”現象

筆者認為，過去學者們將莫高窟藏經洞視為孤例、特例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其實莫高窟藏經洞並非天外來客，它是中國古代佛教歷史文化的產物，與其他地區的經像瘞埋現象有著密切的內在的關係。

正如“廢棄說”者所論證的那樣，在莫高窟藏經洞中收藏的多達幾萬件的佛經寫卷卻不能構成一部完整的大藏經，大部分經卷都缺頭少尾，還有很多經卷是從北朝開始至北宋初年四五百年間累積的陳舊經卷，它們當屬於退出當時寺院流通使用的經卷。當然，與“廢棄說”不同的是，筆者認為，“廢棄”是現代人的觀念，對於古代佛教信徒來說，仍將這些殘破、陳舊而退出流通使用的經像視作寶物，予以集中埋藏供養，使之永久保存。中國國家圖書館藏 BD07711《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五一六》僅存 1 紙，是吐蕃時期抄經的兌廢稿<sup>29</sup>。該卷尾部題記：“此一紙請於故經處安置，為白恐得罪。”<sup>30</sup> 此條題記顯示了當時敦煌寺院裡有關處置廢舊佛經的二條重要資訊：其一，寺院裡有專門存放“故經”即廢舊佛經的處所；其二，即使是抄寫錯誤廢棄的經頁也不可以隨意丟棄，而是要妥為保存。由此可以推斷，莫高窟藏經洞中的藏經是當時敦煌僧人將本地各寺院長期保存的殘破、廢舊的佛經予以有計劃地收集掩藏的結果。

藏經洞中保存的近千件絹畫，雖然大部分保存完整，但它們可能是屬於北宋時已經過時不再流通使用的藝術品。至於藏經洞中保存的四部書，原當屬於“寺學”中使用的教材<sup>31</sup>，也因其過時無用而與退出使用的經像裹挾在一起予以埋藏。

莫高窟藏經洞瘞埋經像的情形其實與黑水城河邊大塔瘞埋西夏、元代佛教經典、唐卡、木版畫等藝術品的情況十分類似。俄國學者薩瑪秀克認為“在‘著名的塔’中放置豐富多樣的藏品並不是罕見的情況，也不是對蒙古入侵的畏懼，而是出於遵照喪葬儀式、禮節和對死者的尊重，便在裡面放滿了書籍、畫和雕塑。”<sup>32</sup> 束錫紅女士認為河邊大塔中的埋藏物“很可能是元代擴建城池、拆除舊城西牆的時候，迫使這些寺廟遷移舊藏的文獻文物資料乃至瘞藏的皇族遺骸<sup>33</sup> 到新建的‘河邊大塔’中去。

<sup>29</sup>參見任繼愈主編《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 98 冊《條記目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 年 6 月，第 23 頁。

<sup>30</sup>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第 98 冊，第 180 頁。

<sup>31</sup>關於“寺學”問題，請參見柴劍虹《敦煌文獻與西部開發》，載《敦煌學與敦煌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32-35 頁；《敦煌文化遺產的人文環境和文化特性》，載《專家講敦煌》，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4 年，第 45-48 頁。

<sup>32</sup>薩瑪秀克《俄藏黑水城藝術品·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

<sup>33</sup>克茲洛夫在黑水城河邊大塔中發現了一具骸骨並將其頭骨帶回國，經俄羅斯學者鑒定為 1 位 50 多歲女性的頭骨。孟列夫曾推測這可能是西夏羅皇后的遺骸。但在筆者看來，推測佛塔中出現皇族遺骸，若無確鑿證據，實屬匪夷所思。如果按照佛塔瘞埋高僧遺骨與舍利的傳統，推測其為一位具有較高地位的比丘尼的遺骸，似乎更可能接近真實一些。

移藏的目的和原因也許和藏經洞有類似之處。但是，沒有理由認為是‘廢棄’，而應當是‘供養’。”<sup>34</sup> 對此觀點筆者深表贊同。

莫高窟藏經洞封閉于北宋初年，這恰好是中原內地許多地方大規模瘞埋佛像之時，這也似乎暗示著它對內地當時佛教文化風潮的呼應關係。

## （二）莫高窟藏經洞屬於佛塔中的“經像瘞埋”現象

初聞此說，大家很可能會詫異莫名。但筆者此說其實自有其依據：

其一，中國石窟自北朝時代既已出現塔形窟。它是融佛教石窟、印度古塔（窣堵婆）及中國傳統的木結構建築於一體的建築形式。已有學者指出，響堂山北齊石窟中已出現一批覆鉢式和樓閣式兩種塔形窟，並影響到安陽靈泉寺隋代開鑿的大住聖窟、安陽寶山萬佛溝、嵐峰山及炳靈寺石窟雕鑿的大批塔形龕<sup>35</sup>。

其二，敦煌石窟自吐蕃時期以後直至晚唐出現了一批窟塔垂直組合關係的石窟，藏經洞所在的洞窟實際上具有塔的地宮的性質和意義。

已有多位敦煌石窟研究的學者指出，吐蕃統治時期及稍後的晚唐時期，莫高窟開鑿的洞窟出現了一種特殊的組合形式，即在崖面上的同一條垂直線上，上下兩個洞窟與崖頂上的土塔形成一組整體性建築，可稱為“塔窟垂直組合形式”，其典型代表有3組，即234窟頂沙坡上的土塔—234窟—237窟、161窟頂塔—161窟—156窟、366窟窟頂塔（已殘毀）—366窟—365窟—16窟<sup>36</sup>。趙曉星博士進一步指出莫高窟這種塔、窟垂直組合的新形式，應是受吐蕃本土的影響，其建築涵義來源於密教中的“寶樓閣”，建築形式最初可能來源於印度，並帶有吐蕃桑耶寺的“三樣式”特徵，或可定名為寶樓閣式石窟建築<sup>37</sup>。

上述研究成果啟示筆者進一步思考，莫高窟塔窟組合其實在一定意義上具有塔的形式與功能。其中吐蕃時期著名僧人洪辯法師主持營建的三層樓，即“吳和尚窟”第16窟、“七佛堂”第365窟、第366窟和其頂上的“法華無垢之塔”這一組塔窟組合形式尤其引起筆者的重視。因為位於第16窟甬道北壁的第17窟正是藏經洞。於是筆者產生一個大膽的推測：在三層樓建成的晚唐直至北宋時代，敦煌人們是把它視作樓閣型塔形建築的，因此在洪辯示寂後將其塑像安置於第17窟，其實具有將其

<sup>34</sup>束錫紅《黑水城“河邊大塔”的性質及斷代——以考察隊的地圖和照片為中心》，《西夏學》第四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sup>35</sup>趙立春《響堂山北齊塔形窟龕》，《中原文物》1991年第4期；《響堂山北齊塔形窟述論》，《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

<sup>36</sup>馬德《從敦煌史料看唐代隴右地區的後吐蕃時代》，載《絲綢之路民族古文字與文化學術討論會文集》，三秦出版社，2007年；沙武田《敦煌吐蕃譯經三藏法師法成功德窟考》，《中國藏學》2008年第3期，另載敦煌研究院編《敦煌吐蕃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甘肅民族出版社，2009年。

<sup>37</sup>趙曉星《莫高窟吐蕃時期塔、窟垂直組合形式探析》，《中國藏學》2012年第3期。

安葬於地宮的象徵意義。而後來又將總數 6 萬餘件的佛教經典和相關文書、近千件絹畫有計劃地、規整地安放其中，並予以封藏，其實也具有將其瘞埋於塔的地宮的象徵意義。這恰與前述古代經像混合瘞埋均出現於佛塔的現象如合符契，似乎並不是偶然的巧合。

總之，將佛教的義理、儀軌和歷史結合起來考察，經像瘞埋現象其實與佛教的供養有密切的關係，它是在佛教三寶供養特別是法寶供養、佛寶供養思想指導下，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佛教信徒對於殘破的、過時的佛教經典、造像予以有計劃地、禮儀性地收集瘞埋，從而達到長久住持供養的一種特殊的佛教儀軌制度和佛教歷史文化現象。深入揭示經像瘞埋現象的根源和演變，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中國古代佛教的思想、文化和藝術發展演變歷史的認識，也有助於深化我們對於莫高窟藏經洞內涵及其封閉原因的認識。

## 附錄：古代中國“經像瘞埋”案例

### 一、佛像瘞埋

瘞埋佛像出土事件是近幾十年來中國考古界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在山東、河北、山西、陝西、河南、四川、寧夏、甘肅等省都出土了多處窖藏的石制、銅制（鎏金銅制）、瓷制等佛教造像。筆者收集有關考古報告，將上述地區出現的 48 例瘞埋佛像出土事件以省區為經、按時間為序簡述如下：

#### 1. 山東

1) 1976 年 3 月，博興縣張官大隊（龍華寺舊址）農民在推土墊房基時發現一窖藏坑內整齊地排列著殘損石造像、白瓷素燒造像，大部造像散失，收回 72 件。有明確紀年銘文的 9 件，2 件為東魏，7 件為北齊。推斷北周武帝毀佛時被毀壞，之後埋藏<sup>38</sup>。

2) 1976 年秋，高青縣胥家村東南方在沿溝底南北長百余米的地段內，出土殘損石造像 7 件，銅造像 1 件。其中有北魏、東魏、北齊明確紀年銘文的 4 件。推斷這批佛造像的被毀和入土，可能與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 年）滅北齊後，繼續推行滅佛政策有關<sup>39</sup>。

3) 1978 年 5 月，諸城縣林家村鎮青雲村農民在地下埋藏的一陶罐內發現銅造像 6 件、銅獅 1 件。其中 2 件有北魏紀年，4 件判斷為北朝後期<sup>40</sup>。

<sup>38</sup>常敘政、李少南《山東省博興縣出土一批北朝造像》，《文物》1983 年第 7 期。

<sup>39</sup>常敘政、于豐華《山東省高青縣出土佛教造像》，《文物》1987 年第 4 期。

<sup>40</sup>韓崗《山東諸城出土北朝銅造像》，《文物》1986 年第 11 期。

4) 上世紀 70 年代，無棣縣水灣公社于何庵大隊農民發現在地下土坑中整齊疊放的殘損石造像 7 件，其中 4 件有北齊紀年年號。推斷埋藏的原因，可能與北周武帝滅佛有關<sup>41</sup>。

5) 1978 年春，茌平縣肖莊王菜瓜村農民在地下埋藏的黑釉瓷甕裡發現 12 件文物，其中有鑲金銅菩薩 1 件、三彩獅子蓮花燈座 1 件、影青瓷菩薩 1 件。推測這批器物早至唐代，晚至元代。可能是因戰亂關係埋藏在地下，其埋藏年代應在元代以後<sup>42</sup>。

6) 1981 年秋，博興縣河東村農民發現地下整齊排列的 5 件銅佛造像，根據藝術風格判斷為北魏、北齊、隋代作品。埋藏時間應在隋末<sup>43</sup>。

7) 1983 年 9 月，博興縣崇德村農民發現盛放在一紅陶甕中的佛教銅造像 101 件，其中能辨識形體的 96 件，較完好的 77 件，有銘文的 44 件，39 件有確切紀年，自北魏太和二年(478)，至隋仁壽三年(603)，歷北魏、東魏、北齊、隋四代，長達 125 年之久；推測其埋藏時間似應在隋末<sup>44</sup>。

8) 1984 年，臨朐縣大關鎮上寺院村原明道寺舍利塔基下的地宮內發現分層整齊排列的石造像，最上層是中小型佛像的軀幹、下肢、胸部、頭像等，中層和底層是較大的造像軀幹、佛頭、背屏式碎塊等，佛頭一般面向下，繞牆根平擺。共清理出大小佛像碎塊 1200 餘塊。最早紀年是北魏孝明帝正光三年(522)，最晚為隋大業三年(607)。埋葬的時代據《明道寺新創舍利塔壁記》為北宋初景德元年(1004)<sup>45</sup>。

9) 1988 年春、1990 年，諸城市城南郊小山丘上修建體育中心時先後發現 2 個窖藏坑，其中 1 個坑內造像殘軀分上下兩層，東西向排列，正面向上；前後共出土佛教石造像殘體 300 多件，計有石蓮座 2 件，佛軀體 70 余件，菩薩軀體 30 余件，各類較完整的頭像 10 餘件，另有瓦 20 餘件，滴水 10 餘件，還有部分殘背光、碑額等。造像中有文字銘刻的 24 件，其中 4 件有東魏武定、北齊天保年號。造像分期為北魏晚期、東魏初期至末期、北齊前期、北周初期四個時期。推斷毀壞于北周武帝毀佛時<sup>46</sup>。

10) 1992 年，壽光縣紀台鎮東方村(龍興寺遺址)農民發現在地下多個土坑內埋藏殘碎佛教石造像，計有 100 餘塊。據造像風格推斷為東魏至北齊作品，造像被毀應是北周武帝並齊後的毀佛運動所為<sup>47</sup>。

11) 1996 年，青州市故龍興寺遺址發現一東西長 8.7、南北寬 6.80 米，面積近 67 平方米的大型窖藏坑，造像排放有序，大致按上、中、下三層排列擺放，出土佛

<sup>41</sup>常敘政《山東無棣出土北齊造像》，《文物》1983 年第 7 期。

<sup>42</sup>聊城地區博物館《山東茌平縣發現一處元代窖藏》，《考古》1985 年第 9 期。

<sup>43</sup>李少南《山東博興的一處銅佛像窖藏》，《文物》1984 年第 5 期。

<sup>44</sup>李少南《山東博興出土百餘件北魏至隋代銅造像》，《文物》1984 年第 5 期。

<sup>45</sup>孫博、宮德傑《山東臨朐明道寺舍利塔地宮佛教造像清理簡報》，《文物》2002 年第 9 期。

<sup>46</sup>任日新《山東諸城發現北朝造像》，《考古》1990 年第 8 期；杜在忠、韓崗《山東諸城佛教石造像》，《考古學報》1994 年第 2 期。

<sup>47</sup>宮德傑、袁慶華《山東壽光龍興寺遺址出土北朝至隋造像》，《文物》2008 年第 9 期。

頭像 144 件、菩薩頭像 46 件、帶造像身或半身造像頭 36 件、其他頭像 10 件、造像殘身 200 餘件、殘經幢 3 件。從造像的時代分析,這批造像從北魏,歷經東魏、北齊、隋、唐、北宋,跨越時間長達 500 餘年,其中尤以北魏、北齊時期的造像出土數量最多。從發掘清理的現場地層分析,其埋藏時間可推至金、元以前。從窖藏中出土的文物分析,最晚的為北宋時期的造像,窖藏中並有北宋末年的“崇寧通寶”等貨幣及北宋白釉瓷碗出土,故認為該窖藏最早埋於北宋末年,或金朝早期<sup>48</sup>。

12) 1996 年 12 月,昌邑市塔爾堡鎮高陽村保垓寺故址發現在古井中埋藏佛教殘石造像 32 件,其中 3 件有東魏和北齊年號<sup>49</sup>。

13) 1997 年,惠民縣惠民鎮沙河楊村農民發現地下埋藏殘損石造像共 17 件,其中 6 件有明確紀年,最早為東魏天平四年(537),最晚北齊武平元年(570)<sup>50</sup>。

14) 2003 年 8 月,濟南市縣西巷唐宋開元寺地宮遺址發現殘損的佛、菩薩、觀音、供養人等石刻像和泥塑近 50 尊,被有規律地排列在地宮中央“壇”的四周。這批佛教造像主要是北齊和唐代的作品。碑文記載此地宮建于北宋熙寧二年(1069)<sup>51</sup>。

## 2. 河北

1) 1954 年、1955 年,曲陽縣修德寺遺址發現地下窖藏坑,石佛造像散亂堆集,小像多集中上面,大像多集中在下面。前後兩次發現的石刻造像共編號 2659 號。有紀年銘造像 247 軀。自北魏神龜三年(520)迄唐天寶九年(750),其間 230 年,歷經北魏、東魏、北齊、隋、唐 5 代,而以東魏、北齊和隋代造像居多。埋佛的時候系在最下層建築之前,也就是至少要早到五代以前<sup>52</sup>。2) 1964 年 1 月、1965 年 2 月,唐縣寺城澗村一古代寺院遺址發現 2 個窖藏坑,第一個窖藏坑中依次放置造像,上部覆蓋瓦片以保護;第二個窖藏坑中胡亂放置造像,還雜有唐代瓦片。第一批出土石造像 15 件,特點是形體小,保存完好;第二批出土石造像 12 件,形體大,殘損不全。造像多有紀年。第一批 15 件均屬北齊小型造像;第 2 批包括東魏 3 件、隋 1 件、唐造像 7 件和一部分殘片<sup>53</sup>。3) 1978 年 3 月,蒿城縣北賈同村農民發現在地下土坑中埋藏完整和較完整石造像 8 件、殘石造像座 4 件,8 件石造像、2 件殘石造像座有紀年,除一件武定七年(西元 549 年)造像屬於東魏末期者外,其餘多件均在北齊年間(西元 550—577 年)。推測可能是周滅北齊後下令滅佛事件前後,由寺內僧人埋入地下的<sup>54</sup>。4) 1992 年 8 月,易縣在建築工地挖地基時發現一批殘損的石造像共 20 餘

<sup>48</sup> 山東省青州市博物館《青州龍興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1998 年第 2 期。

<sup>49</sup> 王君衛《山東昌邑保垓寺故址出土石造像》,《文物》1999 年第 6 期。

<sup>50</sup> 惠民縣文物事業管理處《山東惠民出土一批北朝佛教造像》,《文物》1999 年第 6 期。

<sup>51</sup> 崔大庸、高繼習《濟南老城區發現地宮與佛像窖藏》,《文物天地》,2004 年第 5 期。

<sup>52</sup> 羅福頤《河北省曲陽縣出土石像清理簡報》,《考古通訊》1955 年第 3 期;李錫經《河北曲陽修德寺遺址發掘紀》,《考古通訊》1955 年第 3 期。

<sup>53</sup> 鄭紹宗《唐縣寺城澗村出土石刻造像》,《文物春秋》1990 年第 3 期。

<sup>54</sup> 程紀中《河北蒿城縣發現一批北齊石造像》,《考古》1980 年第 3 期。

件，殘損較甚，全部失去頭部，從殘存軀幹部分可看出有佛、菩薩、弟子、護法武士等，從風格判斷，除一件帶有北魏和平六年（465年）題記的交腳菩薩外，其餘為唐、五代或遼所造。此批殘造像應與後周世宗顯德二年（955年）滅法之舉有關<sup>55</sup>。5) 2006年，南宮市後底閣村古代寺院遺址灰坑中出土殘損石造像及殘塊 283 件，造像種類有佛、菩薩、飛天、力士、弟子、蓮座等；銘文中可見東魏、北齊、唐代紀年年號<sup>56</sup>。6) 2012年1月，臨漳縣習文鄉北吳莊鄴城遺址在近5米左右厚的流沙層下邊發掘出長約3.3米，深1.5米左右不規則的方形窖藏坑，造像雜亂擺放。出土佛教造像數量達到2895件（塊），是目前所知建國以來一次出土數量最多的佛教造像埋藏坑。有題記的造像約占一成，根據造像特徵、題記年代等判斷，這批佛教造像時代主要是東魏、北齊時期，另有個別北魏時期青石造像，亦見到個別唐代風格造像<sup>57</sup>。

### 3. 山西

1) 1957年，沁縣城東北30公里的南涅水村農民發現佛像造像窖藏，出土的石刻造像1100餘件，包括單體造像、造像石塔、造像碑銘三大類型，其中以造像塔為主，約400餘件，單體造像近300尊，最大的2.65米，最小的僅十幾釐米，造像碑、銘文碑共計50餘通。據造像題記和藝術風格判斷，雕刻年代為北魏太和年間至北宋天聖九年（西元477年—西元1031年），相繼延續北魏、東魏、北齊、隋、唐、宋六個朝代約500餘年<sup>58</sup>。

2) 1979年，昔陽縣東冶頭鄉靜陽村地下出土殘損石造像共13件，其中4件有紀年銘文，為東魏、北齊年號，其餘9件無銘文，但它們都出土於同一地點，石刻風格和紋飾也大致相同，可以認為都屬北朝作品<sup>59</sup>。

3) 1986年7月，壽陽縣發現一圓形窖藏，出土金銅造佛及菩薩像62件，力士像3件，護法獅子3件，發願文碑5件，四足床8件，殘座、床、床足、背光、頭光9件，共90件。其中有銘文者40件，占全部造像的44%，其中有確切紀年的35件，自東魏武定四年（546年）至隋大業九年（613年），歷經東魏、北齊、隋三個朝代，長達67年之久<sup>60</sup>。

4) 1987年，平順縣北社鄉東禪村薦福寺遺址發現一處面積約4平方米的土坑內堆放石刻造像11件及部分石像殘塊，包括佛頭像、單體佛坐像和背屏式佛坐像。其中5件底部有題記，4件有乾封、咸亨、調露、垂拱年號，其餘未刻紀年題記的造

<sup>55</sup>張洪印、金申《河北易縣發現一批石造像》，《文物》1997年第7期。

<sup>56</sup>魏曙光、梁亮、張春長《河北南宮後底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2012年第1期。

<sup>57</sup>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鄴城考古隊《河北臨漳縣鄴城遺址北吳莊佛教造像埋藏坑的發現與發掘》，《文物》2012年第4期。

<sup>58</sup>郭海林、李春蘭《南涅水石刻》，《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曹雪霞《山西省沁縣南涅水石刻館》，《文物世界》2012年第2期。

<sup>59</sup>翟盛榮、楊純淵《山西昔陽出土一批北朝石造像》，《文物》1991年第12期。

<sup>60</sup>晉華、吳建國《山西壽陽出土一批東魏至唐代銅造像》，《文物》1991年第2期。

像，從造型和雕刻風格看應屬同期遺物。被毀原因或與唐武宗會昌滅佛有關<sup>61</sup>。

5) 1988年5月，平陸縣城北郊的聖人澗村發現一窖藏坑，出土佛道鑲金銅造像21件、銅造像1件、石造像1件、鑲金銅床座8件、背光3件、“開元通寶”錢1枚；從銅造像題材、造型、鑄造工藝上看，與其他地方發現唐代鑲金銅造像相類，應為唐代早期作品。推測可能與武宗會昌五年滅佛事件有關<sup>62</sup>。

6) 1988年9月，壺關縣北辛村（清涼寺遺址）農民在蓋房挖地基時發現殘損石造像共12件，大多刻有紀年和發願文，其中有唐麟德、咸亨和垂拱年號，均為唐早期作品。再從幾鋪未紀年的造像看，也屬於同一時期的遺物。造像的埋藏可能與唐代武宗會昌年間滅佛有關<sup>63</sup>。

7) 2000年8月，陽泉市郊區河底鎮下章召村發現一洞槽式坑道窖藏，出土佛教石造像24件，全部被人為破壞，無完整保存者。造像的年代可分為兩期：第一期大致在北齊天保四年左右；第二期的年代大致在金晚期到元代初年，窖藏的形成年代也不應晚于元代初年<sup>64</sup>。

8) 2013年，忻州市忻府區秀容街道辦事處西街村發現一窖藏坑，坑內從下到上分別放置佛像身、小型坐佛和佛像頭，夾雜陶器、瓷片、磚、瓦等物；共出土佛教石刻造像39尊、圓盤盞型陶器1件、壺型泥質器1件，還有瓷片、磚、瓦等物件；大部分造像沒有文字題記，據藝術風格推斷為北朝、唐代作品<sup>65</sup>。

#### 4. 河南

1) 1970年，鄭州西郊自來水廠平整球場時發現一銅佛像窖藏，出土10件銅造像、1件鑲金銅造像，保存比較完好；其中有北魏永安年號4件、建平年號1件，東魏天平年號1件、興和年號1件<sup>66</sup>。

2) 1979年冬，寶豐縣前營鄉大吳莊村農民在翻地時發現一窖藏坑，造像排列成整齊的圓周狀，一佛二菩薩大像居中，帶有背光的造像緊圍大像一周，禿頂僧像及道士像面向內為週邊，布於一個土坑中。出土了30餘件銅質造像，收集到的7件中有立式造像2件、單身立像2件、僧侶造像2件、道士造像1件，其中有北齊河清、隋開皇年號<sup>67</sup>。

#### 5. 陝西

<sup>61</sup> 崔利民、劉林、宋文強《平順薦福寺遺址出土的佛教石造像及龍門寺部分造像》，《文物》2004年第11期。

<sup>62</sup> 衛斯《山西平陸聖人澗發現唐代鑲金銅造像窖藏》，《考古》1991年第12期。

<sup>63</sup> 侯良枝《壺關縣出土一批石造像》，《文物世界》2002年第3期。

<sup>64</sup>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陽泉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山西陽泉市下章召村禪智寺佛教造像窖藏清理簡報》，《文物春秋》2001年第3期。

<sup>65</sup> 李培林、郭銀堂《山西忻州出土北朝至唐佛教造像》，《中國文物報》2013年11月1日第2版。

<sup>66</sup> 張秀清《鄭州出土一批北朝銅造像》，《中原文物》1985年第1期。

<sup>67</sup> 鄧城寶《寶豐縣出土銅質造像》，《中原文物》1988年第4期。



1) 1965年5月，扶風縣農民在城關南台村南勝利機械廠工地施工時發現一鎏金銅造像窖藏，出土數十件，徵集到46件鎏金造像，以觀世音菩薩為最多，占總數的三分之一。估計這批鎏金造像基本上都是唐初和盛唐的遺物。窖藏時間很可能與唐武宗滅佛事件有關<sup>68</sup>。

2) 20世紀70年代初，西安西郊桃園地區發現直徑達1米左右的窖藏坑，銅造像散亂堆放，是在慌亂中埋藏的。共出土鎏金銅造像佛坐像4件、佛立像1件、菩薩立像3件、天王像1件、力士立像1件、弟子立像1件、單跪供養人1件、天尊立像2件、天尊坐像2件。出土地系唐長安醴泉坊內的醴泉寺遺址，造像系唐代醴泉寺遺物。推測這批鎏金銅造像被埋的原因與唐“會昌毀佛”有關<sup>69</sup>。

3) 1981年，洛川縣槐柏鄉楊侯村農民發現一窖藏，徵集到鎏金銅造像48尊，其中各類佛像12尊、菩薩像34尊、羅漢像1尊、天王力士像1尊；這組造像沒有紀年銘文，其造型、裝飾大多與寧夏西吉縣及陝西藍田縣水陸庵出土的唐代鎏金造像基本一致，亦應為唐代之物<sup>70</sup>。

4) 1983年，旬陽縣長沙鄉農民發現一窖藏，出土鎏金銅造像8件，其中半跏趺坐佛像1件、立菩薩像3件、跏趺坐菩薩像2件、“乾元重寶”2枚。這一窖藏藏于唐肅宗乾元年間，所藏鎏金銅像的製作年代亦不晚於此時<sup>71</sup>。

5) 1984年3月，臨潼縣武屯鄉邢家村農民發現銅佛像窖藏，出土完整造像297件、殘像42件、零星背光4件、足床24件、殘片54件，是迄今已知銅佛像出土數量最大的一批。這批造像從造型看，最早的為北朝造像，從明確的紀年看，下限為天寶九載。窖藏原因或與唐武宗滅佛有關<sup>72</sup>。

6) 1986年11月，千陽縣上店鄉磨朝村農民發現一銅佛造像窖藏，出土鎏金銅造像11件、銅菩薩造像5件、銅蓮花七座佛像1件、開元通寶1枚。1座鎏金銅菩薩觀世音立像的足床正面左腿刻“供養天寶九載造”字樣，推斷這個窖藏的下限時間應在天寶九年（西元750年）<sup>73</sup>。

7) 1996年6月，延長縣七里村鄉槐里坪村農民發現一窖藏，出土殘損造像碑8件，其中有2件貞觀紀年、1件永徽紀年<sup>74</sup>。

8) 1996年7月，長武縣丁直谷村農民在平整土地時發現一處石刻佛教造像窖藏，出土23件背屏式高浮雕和背龕式高浮雕、1件圓雕殘菩薩像。造像中近半數有

<sup>68</sup>高西省《扶風賢官村唐鎏金銅造像窖藏》，《文博》1987年第5期。

<sup>69</sup>王長啟《唐長安醴泉寺遺址出土的鎏金銅造像》，《考古與文物》2004年第3期。

<sup>70</sup>劉忠民《洛川出土唐代鎏金銅造像》，《考古與文物》1995年第6期。

<sup>71</sup>張沛《旬陽發現唐代鎏金銅造像窖藏》，《文博》1992年第2期。

<sup>72</sup>臨潼縣博物館《陝西臨潼邢家村發現唐代鎏金銅造像窖藏》，《文物》1985年第4期。

<sup>73</sup>高次若、劉明科《陝西千陽縣上店發現唐代銅佛造像窖藏》，《考古與文物》1997年第1期。

<sup>74</sup>白文、尹夏清《陝西延長的一批唐代窖藏造像碑調查》，《文博》2008年第2期。

明確紀年題記，且多為北魏作品<sup>75</sup>。

## 6. 四川

1) 成都市萬佛寺遺址先後四次出土石刻造像：1) 清光緒八年（1882年）首次出土殘佛像；1937年農民種地掘出殘佛像12尊、佛頭26個；1945—1946年間，前四川理學院修建校舍時出土眾多的佛像，均被砸毀埋於房基之下；1953—1954年，鐵二局修建時掘出殘佛像、佛頭、菩薩像、伎樂天、須彌座等200餘件。其中10件有題記紀年，最早者為元嘉二年（425），現存造像最早是梁普通四年（523），最遲為唐大中元年（847）<sup>76</sup>。

2) 1989年2月，邛崃縣東安鄉蜚虹村在修建酒廠的施工中發現了一個由銅蓋扣著的雙耳鼓腹黑陶罐，從中出土鍍金銅造像12尊。從造像風格來看它與邛崃石筍山、蒲江飛仙閣的唐代摩崖造像以及省內外的唐代造像都很相似，基本可以斷定這批銅造像是唐代的，推測其製作年代下限不超過盛唐<sup>77</sup>。

3) 1989年12月，汶川縣（唐代仁壽寺遺址）村民修建時發現地下窖藏坑，出土南朝佛教石造像數件，徵集到4件，散失2件，出土地點為唐代仁壽寺的舊址，由此判斷這批造像原來應是寺院所供奉的。這批造像均無紀年銘刻，但參考成都地區出土的有明確紀年的南朝造像，可以大致推定出這批造像的雕造年代為南朝梁、齊<sup>78</sup>。

4) 1990年6月，成都市商業街施工中發現地下散亂埋藏的殘損佛教石刻造像9尊，其中2件有齊建武、梁天監年號，並據同時出土的花草紋瓦與地層關係判斷，此批造像當是南朝遺物<sup>79</sup>。

5) 1995年5月，成都市西安路拓寬工程施工中發現了一批殘損石刻造像窖藏坑，出土9通石刻造像，除1通為道教造像外，另8通均為佛教造像。這批造像中5通銘文中有齊永明、梁中大通、大同、太清等年號。灰坑填土內沒有六朝以後的遺物，與石刻造像同出的瓦當、瓷片等均是典型的六朝遺物。推測其殘損、埋藏或與北周武帝禁滅佛、道二教有關<sup>80</sup>。

## 7. 寧夏

1985年10月，西吉縣將台鄉王家灣村農民取土時發現一銅佛造像窖藏，造像為隨意堆放，且距地表深不足1米，似為倉促間埋藏。出土鍍金銅造像60件，其中

<sup>75</sup>劉雙智《陝西長武出土一批北魏佛教石造像》，《文物》2006年第1期。

<sup>76</sup>劉長久《成都萬佛寺石刻藝術》，中國古典藝術出版社，1958年；梁曙光《成都萬佛寺出土的梁代石刻造像》，《四川文物》1991年第3期。

<sup>77</sup>何小偉《邛崃縣發現鍍金銅造像窖藏》，《四川文物》1988年第4期。

<sup>78</sup>雷玉華、李裕群、羅進勇《四川汶川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文物》2007年第6期。

<sup>79</sup>張肖馬、雷玉華《成都市商業街南朝石刻造像》，《文物》2001年第10期。

<sup>80</sup>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成都市西安路南朝石刻造像清理簡報》，《文物》1998年第11期。

有佛像 18 身、菩薩像 41 身、力士像 1 身。這批窖藏造像沒有紀年銘文，其題材、造型、鑄造工藝與 1984 年陝西臨潼武屯鄉邢家村出土的 297 件唐代鎏金造像多有相同之處，應為唐代作品<sup>81</sup>。

## 8. 甘肅

1) 1951 年，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人員拆除莫高窟千像塔，此塔為王圓籙於 1910 年主持修建的二層八邊形塔，供集中安放莫高窟石窟內殘損塑像。從中出土佛像總數大約有 150—180 件，絕大多數為泥塑佛像、菩薩像、弟子像、力士像，有 1 件木雕六臂觀音。據造像風格判斷有北魏、初唐、盛唐、宋代造像<sup>82</sup>。

2) 1999 年 5 月，甯縣新甯鎮新寧村（普照寺遺址）農民在維修窯洞時發現一佛像窖藏坑，共有基本完整者 89 件，其中背屏式造像 41 件、龕式造像 30 件、立姿單身菩薩像 2 件、造像碑、造像塔各 1 件。其中有北魏太和年號，據造像風格斷代，其中最早的是北魏時期，其次是西魏、北周、隋，最晚的是唐代。這批石造像大部分會遭人為破壞，有些損害程度嚴重。從現場清理中散亂堆放的情況分析，很可能是毀佛時埋入，埋藏時間應在唐代，至於是毀佛事件還是戰亂所致，現無法斷定<sup>83</sup>。

3) 2012 年 12 月，甘肅省涇川縣城關鎮共池村（古代大雲寺遺址）發掘佛教造像窖藏坑 2 個，其中 1 號窖藏坑中造像分三層於坑中整齊地排列，體量較大的造像均仰身或面西側身而葬，體量較小或殘破者放置於空檔及四周。兩個窖藏坑共出土造像 260 餘件。造像碑、造像塔（龕）、背屏式造像、單體圓雕造像等，其中單體圓雕造像數量較多。造像年代歷經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等時期，延續時代較長<sup>84</sup>。

## （二）經像混合瘞埋

混合瘞埋的佛經、佛像等文物的出土，也是近百年來特別近幾十年來在中國多次發生的引人矚目的考古事件。據筆者梳理，至少有下列 8 起：

1. 1900 年，道士王圓籙在敦煌莫高窟現編第 16 窟甬道北壁發現藏經洞，隨後其中出土文物大多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國，僅有少數留存中國。經世界各國學者 100 多年的調查、整理和研究，現已知道其中主要包含 4-11 世紀產生的 6 萬餘件佛教經典及文書、近千件絹畫等文物。

<sup>81</sup> 西吉縣文物管理所李懷仁《寧夏西吉發現一批唐代鎏金銅造像》，《文物》1988 年第 9 期。

<sup>82</sup> 孫儒僑《我經歷的敦煌石窟保護——上世紀 40 至 60 年代》，《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王慧慧、梁旭澍、蕭薇、張海博《〈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敦煌千佛山皇慶寺緣簿〉錄文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2014 年第 5 期；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敦煌千像塔出土文物目錄》。

<sup>83</sup> 甘肅省寧縣博物館《甘肅寧縣出土北朝石造像》，《文物》2005 年第 1 期。

<sup>84</sup> 吳葦《甘肅涇川佛教遺存調查發掘獲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4 年 1 月 31 日第 8 版。

2. 1909年6月，俄羅斯克茲洛夫率領的考察隊在黑水城西面約300米的“河邊大塔”<sup>85</sup>塔室內發掘了大量西夏文物。但由於克茲洛夫在黑水城匆忙發掘，沒有做細緻的考古記錄，以致將河邊大塔中與黑水城中其他遺址發掘的文物混淆在一起。據俄國學者介紹，冬宮博物館的黑水城出土收藏品一共包括了3500件文物。其中約200件為繪于絲、麻、紙張及木塊上的繪畫作品，或壁畫；一半以上的作品是完整的無缺的，其餘則為斷片。此外，還有20件版畫和素描，70尊泥塑、木雕和銅制的作品，還有一些織品、紙幣和硬幣。另有3000件的物品，包含一些陶、瓷器的碎片，約為元朝（1280-1367年）時期地方所製作銅、鐵或木制的傢俱用品及日常用品。東方研究所收藏的西夏出土文獻約有8000件<sup>86</sup>。學者們一般認為，俄國所藏克茲洛夫在黑水城發掘的文獻、藝術品，大多出於“著名的大塔”。其中主要是西夏佛教經典、繪畫和塑像。據克茲洛夫描述，舍利塔中央有一木杆，在它四周有20尊實物大小的土制雕像，面向內，依序排列著，“像喇嘛們在數百部堆積如山的西夏文手稿前，舉行宗教儀式。”在舍利塔內最上層，物品都亂堆在一起，只有在底層書籍用布包著且整齊地堆放著<sup>87</sup>。

3. 1957年3月30日，蘇州虎丘塔實施維修工程時在第二、三、四層塔心窠穴（天宮）中發現了經箱和經箱外石函、經卷、刺繡經帙、開元通寶和乾元重寶等錢幣、鐵鑄金塗舍利塔和石函、絹繡袱、秘色瓷蓮花碗、銅佛像、檀木雕三連佛龕等文物<sup>88</sup>。

4. 1965年2—4月，浙江溫州白象塔拆除工程時在塔內三至第七層（塔頂）均出土不同時期的各種文物，其中第一層、二層為文物最集中處，占全塔發現文物總數的90%以上，每面塔壁內均砌有方形洞穴，窖藏各類文物，其中以北宋泥塑彩繪菩薩為最多，其次有唐宋銅錢及北宋漆器、木雕、磚雕、佛經、瓷器、銅器、繪畫等；台基中也出土北宋銅錢、瓷器、陶塑、泥塑及繪畫等物<sup>89</sup>。

5. 1978年4月，在蘇州瑞光寺塔第三層塔心的窠穴內發現了珍珠舍利寶幢1座、金書卷軸裝《妙法蓮華經》1部、木刻卷軸裝《妙法蓮華經》1部、碧紙金書《佛說阿彌陀經》1卷、墨書《佛說天地八陽經》1卷、《佛說相輪陀羅尼》105卷、刻板印刷的經咒護輪2張、嵌螺鈿藏經漆匣1只、銅佛像8尊、彩繪描金模制泥質觀音2尊、銅質大小金塗塔各1等文物。根據有年號的題記來看，下限應為北宋天禧元年（1017

<sup>85</sup>對於此塔，俄國學者出於驕傲心理曾給予其“著名的大塔”、“輝煌大塔”等稱號，中國學者認為應該客觀地稱為“河邊大塔”（參見束錫紅、府憲展《俄藏黑水城藝術品·序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束錫紅《黑水城“河邊大塔”的性質及斷代——以考察隊的地圖和照片為中心》，《西夏學》第四輯，寧夏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

<sup>86</sup>Kila Fyodorovna Samosyuk《黑水城的發現》，《絲路上消失的王國——西夏黑水城的佛教藝術》，臺灣國立歷史博物館，1996年6月中文第一版，第46-47頁。

<sup>87</sup>同前揭書，第45頁。

<sup>88</sup>蘇州博物館《蘇州博物館藏虎丘雲岩寺塔瑞光寺塔文物》，文物出版社，2006年10月。

<sup>89</sup>溫州市文物處、溫州市博物館《溫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報告》，《文物》1987年第5期。

年)九月初五日,上限為五代吳楊大和辛卯(931年)。可定為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物<sup>90</sup>。

6.1986年初,浙江省湖州市塔飛英塔維修工程時發現藏於外塔壁中的黑漆木胎嵌螺鈿經函一件(已散架),函內原裝《妙法蓮華經》一部、“周元通寶”銅錢等一批五代文物<sup>91</sup>。

7.1990年7月,寧夏賀蘭縣潘昶鄉紅星村宏佛塔剎座的天宮中發現西夏絹彩佛畫(唐卡)14幅、泥塑彩色佛頭像6尊、佛面像二尊、羅漢頭像18尊、羅漢身像12尊、力士面相二尊、彩繪木雕9件、西夏文佛經木雕版殘塊2000餘塊、西夏文書殘頁5件,另有小木塔、幡帶、木雕、木簡、瓷鉢、瓷珠、琉璃等近100件。該塔始建於西夏晚期(1180—1190年),距今約八百年歷史,明、清等朝進行過修葺<sup>92</sup>。

8.2004年9月24日,陝西耀州神德寺塔在維修塔身時於南面第四層的拱券窗洞中發現了寫經、印刷經、紙本印刷和絹本粉彩佛傳畫等,達30餘種。學者編為242個入藏號,加上續編附屬號,共計306個卷號。其中手寫紙本經卷241個卷號,雕版印刷紙本經卷54個卷號,包含帶有版畫者10種;紙本彩繪二種,絹本彩繪一種。陝西省文物局文物鑒定委員會鑒定為“金元時期作品”;有學者考證為“唐五代宋初時期的經卷、繪畫”<sup>93</sup>。

9.2010年8月,河北曲陽縣恒州鎮小南關村修德寺塔,在距地表約20米高的第三層塔心室內發現銅觀音坐像1、鐵坐佛1、木雕羅漢1、木雕背光坐佛1、經書1冊,為《佛頂心大陀羅尼經》第三卷,東南面牆上有墨書題記數行,其中有明嘉靖十三年紀年,可知發現的佛教經像均系嘉靖十四年至十五年重修塔時放置的明代遺物<sup>94</sup>。

(作者為敦煌研究院研究員)

<sup>90</sup>蘇州市文管會、蘇州博物館《蘇州市瑞光寺塔發現一批五代、北宋文物》,《文物》1979年第11期。

<sup>91</sup>林星兒《湖州飛英塔發現一批壁藏五代文物》,《文物》1994年第2期。

<sup>92</sup>王瑞《宏佛塔建築成就及出土文物價值探論》,《寧夏大學學報》第32卷第6期,2010年11月。

<sup>93</sup>黃征、王雪梅《陝西神德寺塔藏經洞出土文獻Y0001〈金光明經〉卷第二為唐人寫經考》,《中華文史論叢》,2011年第2期;黃征、王雪梅《陝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獻編號簡目》,《敦煌研究》2012年第1期。

<sup>94</sup>王麗敏、高曉靜《曲陽修德寺塔塔心室發現明代佛教造像》,《文物春秋》2012年第2期。